

学校的责任，觉得有稳定的必要。1907年3月，在三人的请求和端方的同意下，郑孝胥出任中国公学监督一职，这意味着评议部形同虚设。1907年12月，三干事修改了章程^⑤，取消了评议部。评议部取消后，学校的最高权力不再掌握在学生手中，而是官派监督；原来公选出的干事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和斋务长。而这种未经全体学生同意的行为，随即引起学生强烈的抗议。钟古愚、李琴鹤、但懋辛、罗毅、朱经农等人的反对最为有力，他们带头组织校友会就校章问题和三干事争论不休，双方均不妥协。1908年3月，郑孝胥辞职。4月，端方派夏敬观继任。9月，中国公学设立董事会。而校友会的反对仍在继续，他们拟定了一个新校章，遭到夏敬观与三干事的反对，这又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郑孝胥出面公开支持三干事。1908年10月，一百六七十名学生宣布退学，另租定校舍于爱而近路庆祥里成立中国新公学。中国新公学实行学生自治，选举朱经农、李琴鹤、罗毅为庶务、教务、斋务干事。为争取社会的支持，中国新公学成立了校董会，由上海地方自治的核心人物李平书担任校董。中国新公学的成立，对于中国公学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时候，中国公学的吴淞新校舍已开始了建设，但学生很少。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执，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21]

然而，中国新公学面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经费的缺乏，李平书派新公学干事四处筹款。1909年8月13日，新公学的李琴鹤、薛蕤圃致书熊希龄（时任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提到奉天巡抚程德全助学三千两，专为建筑校舍之用，请求办理。9月10日，熊希龄致郑孝胥的信中说：新公学学生“绝未损及老公学一语，龄颇嘉其所力，又以薛生等栖栖道路，情状窘迫，特为转恳雪帅，仗公之力，得捐此款，所以声明留充建筑费者，虑新公学学生之随意支销也。异日者，两公学感情浹洽时，再谋合并，则此款亦可为新中国公学还清外欠之需，于雪帅无分新旧之意亦相合也。此中微意，想邀洞及。”^[22]从熊希龄的意思来看，他并非非常在意新公学的成立，而是认为中国公学不能因噎废食，应早日合并，结束分离局面。而“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是一天

不得安稳发展的”。^[23]同时，中国公学内部张邦杰等人也主张调停，中国新公学董事长李平书迫于经费问题也有想要合并的愿望。最后，双方达成调停协议。调停的条件大致是：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新公学所有亏欠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1909年10月，新公学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定解散；愿回旧校者，自由回去。^[24]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所亏欠的11000余元亦由中国公学代为偿还。

两次学潮在中国公学的初期发展中加入了不协调因素。然而，追溯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却不得不把其归之于中国公学学生的身份不同和思想分歧。风潮的背后透露出革命派和立宪派时分时合、分而不裂的局面。其根源，在于清政府在预备立宪问题上的欺骗行为导致立宪派的希望一点点破灭，幻想的破灭使他们逐渐淡化了派别之间的成见，同革命派不断接近。

至于是否有创办者真正想避开政治、希望通过教育达到兴国的目的，梁乔山的话值得深思。他说：“我不教人爱国，也不教人为家，我只教人作成他一个人。因为国家也是个人集成的，没有干净完美的个人，自然没有干净完美的国家。将个人之禀性去因势利导，使个人之天才，得尽量之发展，这便是‘根本的教育’。”^[25]不难看出，梁乔山是想通过创办中国公学以教育培养人才，他希望学生能够自觉地提高认识，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而非直接参加政治活动。遗憾的是，这种脱离现实环境的理想化的教育观在当时并无实现的可能。

三、革命之助力

左舜生在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时说：“孙文在清末提倡革命，一直到辛亥的成功，其所依据以为革命之最重要基础的，不外三个：其一为学生，其二为华侨，其三为新军。学生供给的革命的思想，华侨供给革命的金钱，新军供给革命的势力；把这三种力量运用的恰到好处，革命的势力乃能屡被挫折而卒底成功。”^[26]从成份上讲，中国公学是师生共同参加辛亥革命的组织。

中国公学为辛亥革命在上海的准备做了舆论的影响。1906年春，蒋翊武进入中国公学，由刘复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留日学生谢寅杰邀请蒋翊武^⑥、杨卓林、刘尧澄（蒋、杨、刘三人后来均为武昌起义重要人物）发起竞业学会，三人公推谢寅